

畅海桦 著

KAOGU WENWU LISHIWENHUA

考古·文物·历史文化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山西师范大学史学专业选修课系列教材

考古·文物·历史文化

畅海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文物·历史文化/畅海桦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650-1455-0

I. ①考… II. ①畅… III. ①文物—考古—基本知识—中国 IV. ①K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88979号

考古·文物·历史文化

畅海桦 著

责任编辑 郭娟娟 霍俊樟

出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版次	2013年9月第1版
地址	合肥市屯溪路193号	印次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邮编	230009	开本	710毫米×1010毫米 1/16
电话	编辑部:0551-62903204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印张	14.5
网址	www.hfutpress.com.cn	字数	265千字
E-mail	hfutpress@163.com	印刷	合肥星光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455-0

定价: 35.00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山西师范大学史学专业选修课系列教材

编 委 会

主 任 车效梅

副 主 任 张焕君 王泽壮

主 编 张焕君 王泽壮

成 员 (按姓氏笔画)

王泽壮 车效梅 畅引婷

杨秋梅 张有智 张焕君

序

2013年2月5日，腊月二十五，接到畅海桦老师的电话，说他为了本科生授课而写的讲义要出版了，请我“多多批评，不吝赐教，看后再麻烦写个序”。尽管一个多月前与他的同事，也是领导的张焕君先生还谈起过他，焕君也说过“海桦出手太快了”的话，但我还是没有思想准备，仍然觉得海桦“出手太快了”。接下来用了年前五天的时间，读他的十六章讲义，完成了由考古学史、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的方法，到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时代考古、夏商周考古、秦汉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隋唐考古、宋金元考古、明代考古、清代考古的再学习。说实在的有些知识还是大学期间掌握的，工作后长期不接触便逐渐淡忘了，温故而知新，有着特别的意义。这个“新”，有两重意思，一是出自一位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的海桦笔下，会有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我已经“不识庐山真面目”久矣；二是海桦任教的山西师范大学，2004年才落成晋学博物馆，目前还没有度过筚路蓝缕阶段，他是现任馆长。就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他居然能够写出洋洋洒洒十几万字的讲义来，这得有多少知识的储备和消化！

我也必须给他写这个序，因为我和山西师范大学有着不解之缘。1984年7月，我大学毕业时就被分配到这所大学，当时叫山西师范学院，院长是陶本一先生。那时我年轻气盛，拒绝分配，要到我现在就职的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工作，派遣证装在兜里一装就是一年。当时学院几位领导都说要办考古专业，已经成立了晋国史研究室。后来证明办考古专业即便是放到现在也是不现实的，倒是晋国史研究室成绩很大，出版过《晋国史纲要》（李孟存、常金仓）、《晋国史》（李孟存、李尚师）、《先秦三晋地区的社会与法家文化研究》（张有智）、《制礼作乐·先秦儒家礼学的形成与特征》（张焕君）、《一本书读懂儒家文化》（张焕君、谢耀亭）等著作。任凭领导们好说歹说我就是不答应，并且还托我的大学老师说话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领导接收我，考古研究所领导也多次找人说情。1985年6月陶院长用午休时间，在他的房间跟素不相识的我，进行了长谈。当他看到我执意不服从分配，强调自己“是个社会的人”时，对我依依不舍地说：“我放你走，你是一个社会的人，我们学院



是培养面向社会的人的，殊途同归，希望你早日成才。还有一点，什么时候学院需要你讲课时，希望你义不容辞。”“好的！好的！”我满口答应。陶院长当即为我开了调令，7月我调到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以后的日子里，也经常得到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的诸位先生的帮助，特别是1998年7月我在尧都区下靳墓地发掘工地养病，是我人生最低谷时期，张有智、林宏跃两位先生闻讯到工地看望我，2003年又聘请我兼任山西师范大学历史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可是学院里需要讲授中国考古学概论的老师，因为这关系到从学院里走出来的学生全面掌握知识的程度和能力，也正是我所担心和愧对学院的心病。后来山西师范学院毕业的王谨先生和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毕业的阎向东先生，又都考取研究生不在学院从事教学工作了。此时的海桦肩负起这一重任，而且是在身边没有指导老师的情况下，因此，迫不得已就近找到了我。我虽然好为人师但是只能尽到不及三分之一“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全凭着他聪明好学、能钻研肯吃苦一步步走到今天。打开山西师范大学“师评网”，“非常好！”“讲课风趣幽默，通俗又贴近学生，是难得的好老师！”“讲课讲得好，通俗易懂”，都是听过他的课的学生们的评价。也是海桦给我打电话的2月5日，我为山西省金墓博物馆编写春联，其中就有一副“粉墨登场台上一分钟 摸爬滚打台下十年功”，横批“戏如人生”，用到海桦身上，恰如其分。

言归正传，我们不要用专业考古工作者的眼光来看待和读这本讲义，如果求全责备那就大可不必了，具体原因我在前面已经说清楚了。但是，海桦的讲义对以下两个部分没有讲到或讲得不够，可能是他的兴趣局限吧。

1. 对考古和文物的一般知识，介绍得不够，没有很好地完成作为中国考古学概论的任务，使学生们只能停留在了解的层面上。

2. 对山西的考古发现、研究成果，特别是丁村文化、枣园文化、晋文化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及太原北齐、隋代墓葬等，没有让学生们通过对身边的考古和文物去了解中国甚至国外的考古和文物等。

尽管如此，我长期以来所担心和愧对学院的心病，现内心已轻松释然，因为有海桦老师，有他的实用性很强的讲义和精彩的课堂演讲。

是为序。

田建文

2013年2月10日22:39时值癸巳新年

2013年3月17日9:42修改

前 言

201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关于印发〈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的通知》（学位〔2011〕11号）中明确规定：中国历史学分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三个一级学科，考古学成为中国史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考古学，这个听起来老气横秋的学科，其实出现在中国也就一百年的时间。就这么一个年轻的学科却极大地延伸了人们对历史时空的重构，并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影响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知识体系。

但不管是考古学也好，还是中国史、世界史，其学习和研究都需要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否则研究者只能是在黑暗中摸索最后误入歧途。

第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强调：文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总结提炼民族文化历史的精华，古为今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一个民族如果忘记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只有加强文史研究、保存历史记忆、洞悉历史规律，才能鉴古知今、熔铸古今，开辟新的未来。文史研究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解放思想，鼓励创新，尊重规律，兼容并包；要鼓励文化工作者深入实际、体验生活，创作更多的精神产品，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贡献。

对于史学研究而言，百花齐放是指研究的方法要多种多样，百家争鸣是指学术观点要允许求同存异。

对于研究的客体而言，中国史、世界史研究的是过去的人或事，是一门古老的学科；而考古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研究的也是过去的人或事，只不过从研究时空上看考古学要比中国史、世界史更远、更大。

对于研究的主体而言，作为现在的学习者和研究者并不是历史过程的参与者，无法亲眼看见、亲身经历历史的发生和发展，也无法穿越到那个时代去亲身经历，只能借助历史遗留下来的“物”和“文”来尽量客观公正地展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考古得到的资料，已物是人非。不同学者对其考究的角度不同，反



映的文化本质也就不同，即便是研究同一方向的学者面对同一件考古资料时所反映出的文化本质也不可能绝对相同。相同的是那些考古资料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虽然我们不可能、至少截止到目前也办不到能把考古资料的产生、用途、消失的时间、空间、使用者等完全搞清楚，但我们至少可以根据考古资料考查出其主流文化。表面上看，考古资料是陈年旧物，是文物，似乎毫无生机；实质上，文物却是活灵活现的；它是浓缩的历史，是文化的精髓。我们需要运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知识，对文物进行整理、提炼、加工，再运用到社会科学中。

以山西省侯马市晋国博物馆为例，其主要考古资料有：城市建筑构件；铸铜、制陶、制骨、制圭等手工业作品；侯马盟书；祭祀礼器；墓葬随葬品等。这些文物充分展现了晋文化兼容并蓄、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和淳朴诚信的特性。从其馆藏文物中我们可以看到侯马曾为晋国都城——新田，这里是晋文化的摇篮，记录着晋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风貌，反映着当时历史的辉煌。新田作为当时晋国的都城，它不仅是当时晋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且是当时东周名城之一。

当然，这里离不开文献资料对考古资料的指导作用。将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相结合，进行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得到的结论才更具有真实性。

用文物反映历史文化，反映的是历史，服务的是现在。学术的、专业的不能丢，还得使其大众化、社会化，不能束置于藏经阁。常人看不到，看到的看不懂，倒成了考古者的专利，术业非要专攻了。

目前中国考古学起步晚，考古学真正进入到学校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非但如此，考古学中枯涩难懂的词汇，一直到目前都还没有得到学生们的普遍欢迎。如何让学生了解考古，如何让学历史的读懂考古、让考古解读历史，这也是写作这本书的初衷。

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历史学科下的两个不可分割的孪生兄弟，又如鸟的两个翅膀，虽各自发展，但又相互影响、缺一不可。历史是形而上学的，听得到，看不到，摸不着；考古是形而下学的，看得到，摸得着，但听不到。只有把考古学和历史学科学地结合起来，才能正确反映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

谨希望通过此书达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畅海桦

2013年2月20日

目 录

序	(001)
前 言	(001)
第一讲 中国考古学	(001)
第一节 史学论辩	(001)
第二节 考古学在中国	(008)
第二讲 考古学定义	(014)
第一节 考古学定义与诠释	(014)
第二节 考古学文化	(021)
第三讲 考古学方法	(026)
第一节 微观考古学方法	(026)
第二节 中观考古学方法	(030)
第三节 宏观考古学方法	(032)
第四讲 考古学与历史学	(037)
第一节 什么是历史	(037)
第二节 关系	(039)
第三节 考古学的作用	(041)
第四节 结合	(044)
第五讲 旧石器时代考古	(049)
第一节 人从哪里来	(049)
第二节 化石	(054)
第三节 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说	(061)
第四节 旧石器	(063)



第六讲 新石器时代考古(上)	(066)
第一节 农业	(066)
第二节 手工业	(070)
第七讲 新石器时代考古(下)	(080)
第一节 文字	(080)
第二节 冶铜术	(085)
第三节 城市	(091)
第八讲 夏、商、周考古	(095)
第一节 青铜礼器	(095)
第二节 铁器	(101)
第九讲 秦汉考古(上)	(108)
第一节 秦汉葬礼	(108)
第二节 随葬品	(116)
第十讲 秦汉考古(下)	(122)
第一节 建筑业	(123)
第二节 半两五铢	(131)
第十一讲 魏晋南北朝考古	(136)
第一节 佛教及其建筑	(136)
第二节 道教及其圣地	(142)
第十二讲 唐代考古	(151)
第一节 印刷术	(152)
第二节 唐三彩	(159)
第十三讲 宋代考古	(166)
第一节 宋代砖墓	(166)
第二节 宋代瓷器	(173)

第十四讲 元代考古	(181)
第一节 元代戏曲	(182)
第二节 元青花	(186)
第十五讲 明代考古	(195)
第一节 长城九边	(195)
第二节 紫禁城	(202)
第十六讲 清代考古	(209)
后 记	(220)

第一讲 中国考古学

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而言，考古学是一门新学科。在过去我们只学历史学，这样的历史学还是狭义的历史学，因为它只包含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其实，历史学下设三个一级学科，一个是考古学，另外两个才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①。考古学虽然目前归属于历史学，但在中国起步很晚。考古学是从欧洲开始兴起的，在中国得到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第一节 史学论辩

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中国史学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从第一本史书《尚书》出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史学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一战以后，中国社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严重，史学也开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五四”以后，救亡图存、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从外部刺激了中国史学的转型发展。

中国传统史学受政治环境影响，长期以来受到经学的束缚。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执政力减弱，也没有放松对史学的干预。中国传统史学存在的这个缺陷，最突出表现是忽略民主、文化、风俗、宗教等研究，而特别重视其政治属性。典型的如《史记》《通鉴》等，都是以“资治”为目的，为了满足国家政治需要。

直到一战爆发后，伴随着“五四”运动的洗礼，中国史学走出经学的羁绊，开始关注现实、关注外部世界，其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① 为了叙述和理解方便，本书中凡是涉及历史学就是指广义上的历史学科；凡是狭义历史学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就称为史学。



· 西学东渐

历经“一战”、“五四”运动的洗涤，炎黄子孙逐渐消除了鸦片战争以来在心中形成的民族自卑感。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自觉意识增强，由此而形成了全球化文化意识，使中国与世界文化互动局面产生。

“五四”以前，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收”主要是在军、工、商、医、科技方面，间或有学习社会哲学方面者，范围也在法政、经济等实用性较强的科目里。

“五四”时期，这种局面发生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是民主与科学。此时，人类学、考古学、地理学、文学等大量“输入”到中国，西方文化输入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多元化格局。传统史学受到这种格局影响，在撰史研究方面，逐渐摆脱经学旧习，更主要的在于国内史学界此时普遍持有一种民主开放意识，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

西方多元化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经学终结后中国传统史学面临的理论真空。走出经学羁绊的新史学感受到了挣脱束缚后的开阔视野。

“五四”时期中国史学转型的一个重要推动力是对西方史学的引进以及中西方史学的沟通。

“五四”时期西方史学和国内史学互动的一个重大收获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实证方法主旨在于以自然科学依据经验事实和观察求得事物变化规律、考察人类社会活动，从而揭示各种复杂社会现象和历史演变规律^①。“实证”方法注重原始资料，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职能在于搜查、考证和编辑史料，为重建信史提供坚实依据。



王国维

在此方面，王国维对史学研究的贡献最为重要。他利用甲骨文、金文材料对古史进行考证，考证内容包括民族史、商周地理、殷周世系、殷周制度与文化等，继而提出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

^① 胡逢祥：《“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坛与西方现代史学》，《学术月刊》1996年第12期。

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①

在此影响下，顾颉刚于1923年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引起了史学界震动。顾颉刚的疑古学说形成的根本原因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的思想解放。他的学说以及由此引起的古史大战，促进了中国史学从观点到方法、从内容到形式都产生了革命性变化，而产生这些变化的动因则是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两个文明之间的较量。

· 中西文明对比

中西文化交流的基础是两个文明的对比。西方文明对当时的国人来讲就是“洋”字打头，什么事都“洋”比如“洋枪”“洋炮”“洋船”“洋烟”“洋火”，就连人都称为“洋人”。国人尽其所能地去学习、去模仿，这一部分人当时被称作“假洋鬼子”。

而中国古文明被时人称作土文明，如“土枪”“土炮”，中国医术被称作“土方”，国人对自己也谦卑地称为“土包子”，穿个衣服也是“土气”，生产出的东西还得称为“土特产”。

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人看到，“师夷之技”虽能强国，却不能用文明消灭野蛮。西方文明有好的东西，也有野蛮的一面；中国文明有不如西方文明的地方，但也有西方不能相比的。比如，中国古代文明，有领先于世界的科技和文化，然而却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看来不仅是洋枪、洋炮的缘故，需要对中国古代文明进行彻底的梳理。

可是，真正对中国古文明有所了解还是从西方人那里得到的几个名词：“造纸、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但这些东西最早也是汉朝时的事。

比秦汉还要早的历史，说得上的是三皇五帝，但三皇五帝是传说，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要说西（方）人说不信，就连国人自己也不信。

随着甲骨文的出土和研究，对夏商周的确认，才逐渐明目。1917年王国维将甲骨文和商代联系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发表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确认商代是存在的。

历史是人类文明在时间上的坐标。有确切的纪年记载越详细、越古老，对我们研究上古社会就越有帮助。从文献记载了解到，中国文明史上真正有文献记载纪年的“信史”，是著名的“国人暴动”，即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而此前历史纪年都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司马迁在《史记》里提出过，

^① 王国维：《王国维考古学文辑》，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5页。



黄帝纪年有文献记载，但由于其说词模糊且又不一致，因而他在《史记》中并没有把此类学说摘录下来，从此在古代文献中就再也见到过有关传说时代的相关纪年。

中国古文明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标志是什么？文明的因子有哪些？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如何解决？

· 史学派别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孔子《论语》）好学好思是中华民族一大优秀特色。在中西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潮流中，产生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辨伪为特征的史学派别——古史辨派。

纵观秦汉以来史学界，对史学研究主要有四种派别即：“信古、疑古、考古、释古”。

“信古”出自《论语·述而》中的一句话：“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意思就是相信并爱好古代东西。信古派认为先秦书籍都是古代人传下来的，所记载的和传说的不是空穴来风，必有所据，都为实录，不能轻易怀疑。

疑古派认为古代史书存在真和伪，所传古书定有失实之处，不可轻信。

考古派认为，先不论古史真伪，就看时人对古史争辩一事，就知纸上得来总是浅，材料没力度，而且大家对古史的争议也不出纸堆之范围，还是要借助于锄头考古学的发掘资料作为证据才能确定为真。

释古派认为，用新史观为方法、新材料为依据加以归纳推理，得出正确结论即可成为可信之古史。

对于第一门派“信古”者，可持有否定态度。这种流派目前来讲已经没有什么市场，想必将来大概就要被淘汰，即使不被淘汰，对于史学界也没有什么影响了。战国时孟子就有精辟的论断，在《孟子·尽心章句下》中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为此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说自己在读《武成》这篇文章时，也只相信其中的一小部分，并对仁义的周武王提出了疑问：假如周武王是仁人君子，为何在攻打商纣王时，兵卒的鲜血竟然涌流成河，使木制兵器都漂浮起来了呢？看来“信古”一派的确也是没有什么大市场了。

对于第四门派“释古”者来讲，释古派的任务就是在整个史学研究中对待所得史料进行综合判断，融会贯通，阐释历史发展规律。“一段历史的完成，必须经过审查史料及融会贯通两个阶段，而且必须到融会贯通的阶段，历史

方能完成。但就一个历史学家的工作来说，他尽可作此两阶段中之任何阶段，或任何阶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种的学问，对于一个人，都是太大了。”^①对于这一派的工作，我们也无可厚非，只是补充说明一点，审查史料，对今天来讲，应该包括考古材料。

· 疑古

除了前面两种外，还有疑古和考古。这两个派别对后来史学理论和方法影响非常大，先来谈疑古。

怀疑古史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史书肯定是人写的。写书的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写自传（或自事），一种是写他传（或他事）。写自传的人不会把本人言行从出生到死亡一个字一件事不落地写下来，写他传的就更不可能了。

事实上，任何一个史学研究者与历史事实之间都存在着时间和空间差距，他不可能直接面对历史事实的全部，所以也根本不可能亲身经历那些已经湮没的历史事实。就是假如有穿越之术，也只能穿越到他要了解的这一段历史中，剩下的要想再了解除非有天主全智全能的本领，否则还得依靠二手材料，结合自己的综合判断去重组历史事实。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独到的见解：“由于这些事件已不复存在，所以，史学家也不可能直接与事件本身打交道。他所能接触的仅仅是这一事件的有关记载。简单说来，他接触的不是事件，而是证明曾经发生过这一事实的有关记载。当我们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些铁的事实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仅是一份证实发生过某个事件的材料。因此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差距，即已经消失了的、短暂的事件与一份证实那一事件的、保存下来的材料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构成历史事实的正是这个关于事实的证明。如果确实如此，历史事实就不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可以使人们想象地再现这一事件的一个象征。既然是象征，说它是冷酷的或铁一般的，就没有什么价值可言了。甚至评论它是真的或假的都是危险的，最安全的说法是说这个象征或多或少是适当的。”^②

从目前浩瀚如烟的文献资料中，可以了解到，有些历史资料对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录不但与历史事实相背离，而且往往是对历史事实的伪造或对历史真相的掩蔽和扭曲。

① 罗根泽编著：《古史辨（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页。

② 张文杰等编译：《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229页。



造成这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研究者主观上的原因，另一方面是由于客观上的原因。

从主观上来说，每个研究者从事历史研究时总是从全部历史中选择和自己有关的去研究，这样，他所研究的对象永远小于（或少于）历史事实总和。“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假若某个人手头拥有一天内在全世界所出版的所有的报纸，又假若他得到保证说这里报道的每个字都是确实的真理。即使如此，他又拿这些报纸怎么办呢？他又如何组织它们呢？再假如进一步说，他认为所有这些事实都是同等重要的——但他就是不能写一部包括所有这些事实的单独一天的历史，他只得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所有的事实都复制出来，他也只得突出某些事实，贬抑另一些事实。而就在你做这桩事情的时候，你也就开始变得主观起来”^①。

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理论视角，即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一个史学研究者研究的历史事实是通过一定的理论视角显现出来的。

从客观上来说，历史事实不管研究者去不去研究、去不去涉及，事实总是在那里客观地存在，比如，“吃、喝、穿、住、行”是人类每天都要亲身经历的事实，但在唯心主义者的眼中，这些是视而不见的。

正是由于客观和主观上的原因，导致了我們目前见到的史料总是和原史之间有一定差距。

其实，对于史书怀疑，孟子还不是最早。《论语·子张》中记载，孔子学生子贡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说商纣王不会像古史中所描绘的那样残暴，是后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之于其一生的缘故。而在史学界争论最持久、争鸣最多的莫过于自汉代就已起硝烟的今古文之争。

先秦时期的史书，历来就有争论。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到汉朝时大多数史书都残缺散佚了。为了弥补史料，汉代学者把那些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经”，记述下来，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西汉中期，先秦经籍文本不断出土或被发现，此被称为“古文经”。从此，今古文之争掀起波澜。

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受“文字狱”的影响，疑古辨伪之风再度兴起，掀起了长达百年之久的考辨高潮，并由此产生了著名的“乾嘉学派”。

“乾嘉学派”对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重视客观资料。他们广泛收集资料，进而归纳研究，对研究结果不从主观上轻下判断。但由于当时乾嘉

^① 田汝康等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3—134页。